

解放軍 史

★ 八路军军史

[1937—1945]

上卷

张立华 董宝训◎著

青島出版社 国家一级出版社
QINGDAO PUBLISHING HOUSE
金島印刷厂印刷

解放战争史

★ 八路军军史 [1937—1945]
上卷

张立华 董宝训◎著

青島出版社 国家一级出版社
CIP 数据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目 录

导 论	001
第一章 八路军的组建	017
一 从抗日反蒋到联蒋抗日	019
二 国共两党合作抗日谈判	030
三 卢沟桥事变爆发 红军请缨抗日	040
四 御外侮 国共再携手	051
五 八路军的组建	056
第二章 八路军开赴抗日前线	069
一 洛川会议筹商抗战大计	071
二 陕北誓师 东渡黄河	074
三 平型关首战告捷	089
四 在太原会战中配合友军作战	098
五 粉碎日军对河防的进攻	110
第三章 实施战略展开 开辟敌后战场	119
一 太原失陷后的华北局势	121
二 军事战略思想的转变	125
三 实施战略展开 开辟敌后战场	132
四 游击战争理论的系统性发展	140
五 从山地游击战向平原游击战发展	152
第四章 创建抗日根据地	167
一 晋察冀根据地的创建	169



第二部
八路军史

203	二 晋绥抗日根据地的开辟
219	三 晋冀豫抗日根据地的创建
241	四 晋西南抗日根据地的创建
248	五 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创建
254	六 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开辟
269	第五章 八路军的发展壮大与巩固抗日根据地的斗争
271	一 抗日战争相持阶段到来后的形势
282	二 巩固和发展晋察冀根据地的斗争
317	三 120 师与晋绥抗日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
329	四 129 师巩固和发展晋冀豫抗日根据地的斗争
340	五 129 师与冀鲁豫边区的巩固和发展
343	六 115 师主力入鲁巩固和发展山东抗日根据地
363	七 八路军主力一部南下华中与新四军协同作战
367	第六章 反磨擦 反投降 反分裂
369	一 国民党政府抗战政策的转变
377	二 河北、山东等地的磨擦与反磨擦斗争
387	三 粉碎阎锡山发动的“十二月事变”
399	四 反击国民党顽固派对晋冀鲁豫地区的进攻
410	五 制止国民党顽固派对陕甘宁边区的进攻
417	六 粉碎国民党顽固派的第三次反共高潮
427	第七章 加强军政建设 完善后勤保障
429	一 部队的整编整训
440	二 开办军政学校 培养抗日干部
454	三 完善后勤保障制度



目 录

四 自力更生 依靠群众 保证军需供应	465
五 后勤战线上的对敌斗争	473
六 八路军的兵工生产	480
第八章 百团大战	489
一 战前形势与战役准备	491
二 交通大破袭	506
三 扩大战果	518
四 反“扫荡”斗争	529
五 百团大战的影响	538
第九章 反“扫荡” 反“蚕食” 反封锁	545
一 日军在华北的“治安强化”	547
二 国民党顽固派对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封锁和进攻	559
三 中共中央军委《关于抗日根据地军事建设的指示》	561
四 粉碎日军对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扫荡”	564
五 晋绥根据地的反“扫荡”作战	591
六 晋冀鲁豫根据地的反“扫荡”斗争	604
七 山东根据地的反“扫荡”斗争	623
八 开展反封锁、反“蚕食”斗争	638
第十章 八路军政治、经济、文化建设	649
一 走政治建军之路	651
二 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	660
三 开展整风运动	665
四 贯彻精兵简政方针 开展生产自救运动	673



第二部
八路军史

697	五 积极参加根据地建设
709	第十一章 八路军恢复抗日根据地的斗争
711	一 1943 年的形势及八路军的任务
716	二 贯彻“敌进我进”方针 恢复和扩大根据地
737	三 晋察冀军区展开反“扫荡”作战
747	四 晋绥抗日根据地的恢复
750	五 晋冀鲁豫根据地的恢复和发展
758	六 山东抗日根据地的恢复与发展
767	第十二章 八路军的局部反攻
769	一 1944 年春夏季八路军的攻势作战
788	二 八路军的秋冬季攻势
804	三 发展河南 缩毂中原
810	四 进军湘粤赣边
817	第十三章 “对日寇的最后一战”
819	一 1945 年初的国内外形势与八路军的方针、任务
824	二 八路军的春季攻势作战
837	三 八路军发动夏季攻势作战
859	四 “对日寇的最后一战”
905	主要参考文献



导 论



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了蓄谋已久的全面侵华战争,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再一次被推到了生死存亡的历史关头。

全面侵华战争的爆发,是日本帝国主义长期推行以灭亡中国为首要目标,进而吞并亚洲的“大陆政策”的直接结果。

早在明治中期,日本就形成了以中国为主要扩张目标的大陆政策。1868年4月6日,日本政府以天皇名义发布《五条誓文》和《宸翰》(御笔信),宣布要“经营天下,安抚汝等亿兆,欲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①,提出了对外侵略扩张的总方针。1872年12月28日,明治政府发布《全国募兵诏书》,规定全体国民都要负担兵役,交纳“血税”,“以生命报效国家”,推行所谓“国民皆兵主义”。在以后的20多年时间里,日本逐步形成了以“武士道”精神为支撑、实行军令与军政分立的军国主义体制。1878年,陆军省参谋局改组为参谋本部,直属于天皇,掌管作战、用兵等军令大权,与隶属于政府的掌管军政权的陆军省分立,初步形成了军令与军政分立的二元体制。1889年,日本颁布《明治宪法》,规定由天皇总揽军队的统帅权,并赋予军令长官“帷幄上奏权”,即有关军令事项不经过内阁而直接上奏天皇,由天皇裁定之后施行。统帅权独立制与帷幄上奏权使军队在国家政权中获得独立地位,内阁丧失了兵权。日本军国主义体制的形成为其对外侵略扩张铺平了道路。

1874年,日本借口所谓难民问题,发动“征台之役”,武装进攻中国台湾,

^① [日]伊成文等:《明治维新史》,第356页,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



第二部
八路军史

经英国调停达成协议,迫使软弱的清政府承认日本出兵是“保民义举”,赔偿白银 50 万两。1879 年,日本镇压了琉球王的反抗,将琉球改为冲绳县,正式并入日本版图。

19 世纪 90 年代初,日本的对外侵略扩张路线进一步具体化为“大陆政策”。1890 年 12 月 6 日,在日本第一届帝国会议上,内阁首相山县有朋发表施政演说,提出“盖国家独立自卫之道,本有二途。第一曰守护主权线,第二曰保卫利益线。其中,所谓主权线,国家之疆域也;所谓利益线,曰与主权线之安危密切有关之区域也……欲维持一国之独立,唯独守主权线,决非充分,亦必然保护其利益线”,并公然宣称“我方利益线之焦点,在于朝鲜”。^① 同一年,山县有朋还抛出《军事意见书》和《外交政略论》,鼓吹侵略中国、占领朝鲜,与英俄等列强争霸东亚大陆的控制权。日本外相青木周藏则向日本政府提交《东亚列国之权衡》,提出将俄国逐出西伯利亚,由日本“领有朝鲜、满洲和俄国沿海州”,对朝鲜“采取强硬手段,实行干涉主义”。^②

在“大陆政策”的驱动下,日本进一步加快了对外侵略扩张的步伐。1894—1895 年,日本发动甲午战争,占领朝鲜,并割取中国的辽东半岛(后因列强干预退还)和台湾、澎湖列岛,勒索赔款白银 2.3 亿两。1900 年,日本参加八国联军侵华战争,迫使清政府签订《辛丑条约》,取得在中国天津和北京等地的驻兵权。1904—1905 年,日本在中国东北地区发动了对俄国的战争,取得了俄国在中国东北南部的殖民权益。此后,日、俄又相互勾结,3 次签订《日俄条约》,将中国东北北部和内蒙古东部划为日本的势力范围,称为满蒙地区,视其为独占地盘。

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的频频得手,进一步膨胀了它的扩张欲望和冒险心理。1907 年,日本政府和军部以天皇御批的形式,决定了《国防方针》及《用兵纲领》,使大陆政策进一步具体化。《国防方针》及《用兵纲领》从对外扩张的方

① [日]大山梓:《山县有朋意见书》,第 197 页,原书房,1966。转引自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著《中国抗日战争史》上卷第 31 页,解放军出版社,1991。

② [日]藤村道生:《日清战争》(中译本),第 21 页。转引自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著《中国抗日战争史》上卷第 32 页,解放军出版社,1991。



针出发和日本的国力考虑,确立了“攻势作战”和“速战速决”两大原则,以先发制人、不宣而战、突然袭击作为日本进行对外侵略扩张的基本战略。鉴于俄国在中国东北地区势力的存在,日本认为俄国是其推行大陆政策的最大障碍,因而视俄国为主要假想敌。

1914年,日本利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西方列强在欧洲厮杀、无力顾及亚洲事务的有利时机,出兵山东,强夺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殖民权益。1915年,日本又利用袁世凯称帝的机会,进行威逼和利诱,提出了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列强回到亚洲,日本的扩张锋芒受到一定的遏制。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于1918年和1923年对《国防方针》进行了两次修订。鉴于日本与西方列强矛盾的加深,在两次《国防方针》的修改中,关于是否需要多国作战问题成为考虑的一个重要内容。在1918年的《国防方针》第一次修订中,日本提出要做对多国作战的准备,但又认为日本国力难以承受,应力争避免对多国作战。华盛顿会议后,日本与西方列强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加深,更加刺激了日本的军事冒险性。在1923年第二次对《国防方针》的修订中,日本制定了以美、俄、中为作战次序的战略构想,从而确立了对多国的进攻作战原则。修订后的《国防方针》规定:帝国国防方针应该立即以“防备与我有冲突的可能性且具有强大国力与兵力的美国为主要目标,对于与我接壤的中俄两国应以亲善之旨为用,但同时应经常保持对其震慑之威力”。^①日本把美国作为其头号假想敌,是因为美国对其推行大陆政策构成了最大威胁,不扫除这个障碍就无法推行其大陆政策。所以,所谓对美、俄作战,实质上是对中国大陆的争夺。

根据上述《国防方针》,日本于1925年制定了1926年度作战计划,计划动员总兵力32个师,其兵力具体分配是:对美作战3个师又1个支队,对俄作战13个师又1个支队,对华作战16个师。从兵力分配看,其作战重心在对华作战,而对俄作战的大部分兵力也还是以中国东北地区为作战区域。

^① [日]防卫厅防卫研究所研究室:《陆军军战备》,第93页,朝云新闻社,1979。转引自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著《中国抗日战争史》上卷第35—36页,解放军出版社,1991。



第二部
八路军史

在对华作战计划中,其兵力分配用于京津及山东方面作战7个师,多于其他方面。具体计划与兵力分配是:在东北方面,部署关东军5个师,首要目标是“平定”南满洲及北满一部,重点以间岛(延边)地区及南满铁路沿线,大致以嫩江以南之四(平)洮(南)线、辽东半岛地区为第一阶段作战目标,在其他地区的兵力行使则依具体情况相机而定。在华北的京津、山东方面,设置1个方面军,包括两个军共7个师,准备在秦皇岛、塘沽、天津及山东半岛以足够兵力登陆,占领河北及山东要地。

在华东、华中的上海和汉口方面,派遣1个军共3个师,在上海附近的扬子江岸选定登陆地点,其作战实施应依据具体情况而定。

在福建方面,派遣台湾军1个师,依具体情况相机处置。^①

1926年度作战计划成为1931年日本侵华作战的蓝本。在此期间,日本还筹划了对中国的心脏地区汉口的进攻作战,其方案是“根据情况,以华北驻屯军沿京汉线南下与沿扬子江西进的华东军相互策应,进行在汉口附近的作战”。^②1938年日本对华中的进攻正是这一方案的具体化。

1927年6月27日,日本内阁首相兼外相田中义一在东京主持召开了以解决“满蒙政策”为中心议题的“东方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外务省、关东军、陆军省、参谋部、海军省等各方面官员。会议历时10天。7月7日,由田中宣布了8条《对华政策纲要》,宣称:“对于满蒙,尤其东三省地方,因与我国防及国民生存具有重大利害关系,我国不仅必须予以特殊考虑,且对该地区和平之维持与经济之发展,使之成为内外人士安居之所,作为接壤之邻邦,尤须具有责任感。”“万一动乱波及满蒙,治安紊乱,有侵害我在该地特殊地位、权益之虞时,不论其来自何方,均应加以防护,并须做好准备,为保护内外人士安居、发展及时采取适当措施。”^③

① 《中国抗日战争史》,上卷,第36—37页,解放军出版社,1991。

② [日]防卫厅防卫研究所研究室:《战史丛书·大本营陆军部》(1),第260页,朝云新闻社,1974。转引自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著《中国抗日战争史》上卷第37页,解放军出版社,1991。

③ 《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上,第140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



日本帝国主义独占中国的图谋由来已久。图为1927年6月27日—7月7日日本田中内阁召开的“东方会议”。会议确定了把“满蒙”同“中国本土”分离开来的方针，制定了先征服“满蒙”，再征服“支那”的计划。右起第3人为日本首相田中义一。

7月25日，首相田中义一根据会议内容起草了一份奏折呈送天皇，此即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奏折说：“所谓满蒙者，乃奉天、吉林、黑龙江及内外蒙古是也，广袤七万四千方里，人口二千八百万人。较我日本帝国国土（朝鲜及台湾除外）大逾三倍。其人口只有我国三分之一。不惟地广人稀令人羡慕，农矿森林等物之丰富，世之无其匹敌……故历代内阁之施政于满蒙者，无不依明治大帝之遗训，扩展其规模，完成新大陆政策……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倘支那完全可被我国征服，其他如小中亚细亚及印度南洋等，异服之民族必畏我敬我而降于我，使世界知东亚为我国之东亚，永不敢向我侵犯。此乃明治大帝之遗策，是亦我日本帝国之存立上必要之事也……考我国之现势及将来，如欲造成昭和新政，必须以积极的对满蒙强取权利为主义。以权利而培养贸易，此不但可制支那工业之发达，亦可避欧势东渐，策之优，计之善，莫过于此。我对满蒙权利如可真实的〔地〕到我手，则以



第二部
八路军史

满蒙为根据,以贸易之假面具风靡支那四百余州;再则以满蒙之权利为司令塔,而攫取全支那之利源。以支那之富源而作征服印度及南洋各岛以及中小亚细亚、欧罗巴之用,我大和民族之欲步武于亚细亚大陆者,握执满蒙权利乃其第一大关键也。”^①

在东京的“东方会议”之后,为了加快实行侵略计划的步伐,同年8月15—25日,日本又在中国旅顺秘密召开了第二次“东方会议”,由日本外务相次官森恪主持,驻华公使芳泽谦吉、关东厅长官儿玉秀雄、驻奉天总领事吉田茂以及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等人参加。会议针对侵略中国东北的具体步骤进行了策划。

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日本国内矛盾激化,连续发生经济危机。1927年日本发生了金融危机。1929年秋,始自美国的世界范围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波及日本,至1931年达到了顶点。经济危机对日本经济造成空前严重的破坏,工业总产值比1929年危机前减少了32.5%,出口减少了37.3%,进口减少了40.3%。^②经济危机加深了政治危机,反映垄断资产阶级对外加紧侵略要求的法西斯势力频繁发动政变。在1929—1937年的8年间,日本发生8次内阁更迭,工人罢工和农民抗缴租税的斗争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为了摆脱政治、经济危机和实现夺取中国东北的侵略计划,日本于1931年蓄谋制造了九一八事变,发动了侵略中国东北的局部战争。

由于国民党蒋介石政府采取“绝对不抵抗”政策,九一八事变后,在仅仅4个多月的时间里,日军就占领了中国东北3省,并于1932年3月操纵建立了“满洲国”傀儡政权。侵略中国东北3省的顺利得手,进一步增长了日本对中国抵抗能力的轻视,也因此助长了日本加紧侵吞整个中国的狂妄野心。

^① 《时事月报》第1卷第2期,南京版,1929年12月。转引自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著《中国抗日战争史》上卷第38—39页,解放军出版社,1991。

^② 张一民等:《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抗日战争时期》,第2页,解放军出版社,2000。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故意炸毁了沈阳北郊柳条沟附近的南满铁路,反诬是中国军队所为,并以此为借口,当夜突然进攻中国军队驻地北大营。在蒋介石“绝对不抵抗”的命令下,东北军大部撤至山海关内。图为9月19日日军在沈阳城墙上向中国军队进攻。



1932年3月9日,日本帝国主义扶植清朝废帝爱新觉罗·溥仪在长春成立“满洲国”。图为溥仪(中坐者)就任“满洲国”执政时的合影。前排左起:5. 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7. 伪国务总理郑孝胥。



第二部
八路军史



驻守上海的国民党第19路军3万余爱国官兵在蒋光鼐、蔡廷锴率领下，英勇抗击日本侵略军。图为第19路军士兵在追击逃窜的日军。

1932年1月28日，日军对上海驻军发动军事进攻，制造了一·二八事变。在国民党爱国将领蔡廷锴、蒋光鼐和张治中的指挥下，国民党第19路军和第5军等部队进行了英勇的抵抗，打退了日军的连续进攻。日军死伤逾万，并三易

主帅。然而，国民党蒋介石政府决意对日妥协，不向上海增派援军，致使第19路军和第5军在优势敌军进攻下被迫撤离上海。5月5日，南京国民政府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淞沪停战协定》，承认日军可以留驻上海，而中国军队必须撤离上海且不得在上海周围地区驻防，并取缔抗日活动。

日本侵吞中国东北3省后，按既定计划发动对华北的进攻。1933年1月初日军攻占山海关，3月侵占了热河全省，接着向长城一线进犯。国民党第29军、第32军、第17军和东北军一部在长城之喜峰口、冷口、古北口等地进行了英勇抗击。

由于蒋介石推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集中力量“围剿”中国工农红军，不向长城防线增援，致使守军在日军的疯狂进攻下于5月中旬放弃长城防线，河北省东部20余县遂陷入敌手。5月31日，南京国民政府与日本达成了出卖领土主权的《塘沽协定》，规定中国军队立即撤退至延庆、昌平、高丽营、顺义、通州、香河、宝坻、林亭口、宁河、芦台所连之线以西以南地区，不得越过该线，不得有挑战扰乱之行动。日军为确悉上述规定执行情形，随时可用飞机及其他方法进行观察，中国方面对此应加以保护及予以各种便利。日军在证实中



国军队遵守上述规定后,不再越过该线追击,并自动归还至长城之线。长城线以南及上述规定之线以北以东地区的治安维持,由中国警察机关担任,但不得用刺激日军感情的武力团体。



1933年3月,日本侵略军进犯长城各关口。驻守喜峰口的国民党第29军英勇抵抗。图为中国军队在喜峰口与古北口之间的罗文峪布防。



日军攻占冷口、滦东后,兵逼平津,迫使中国政府签订了《塘沽协定》,默认日本对东北、热河的军事占领,冀东作为缓冲区任由日军自由出入,华北门户洞开。图为中(右)日双方代表在塘沽会议上。



第二部
八路军史

《塘沽协定》不仅事实上承认了日本占领东北3省和热河的合法性,而且将冀东各县划为日军可以“自由行动”而中国军队不能进入的“非武装区”,中国军队则退至北平、天津附近。这样,就置华北于日军监视和控制之下,为日本攻取北平、天津,进而夺取整个华北打开了方便之门。

《塘沽协定》实施后,日本对华北进一步进行大规模的扩张。1933年7月6日,日本陆军省和参谋部向内阁提出《对华政策大纲》,对华北问题提出两点建议:“(一)虽然我们暂时容忍华北政权保持为南京政府的一部分,我们应当压迫它去实现塘沽协定的意义。排除对日货的抵制与抗日运动,保持并延伸这一形势的发展。(二)我们必须使华北政权压制国民党在华北的抗日活动,并使国民党逐渐减少力量,最后迫使其解体。”^①1933年9月25日,日本海军部提出《海军对华时局处理方针》,提出对华北问题的3条方策,其基本精神是使华北地区“通过履行停战协定,根绝抗日排货及其他反日运动,消除党部势力等,使华北的空气转向亲日”,并“逐渐在实际上独立于中央政权的政令之外,恢复同日满两国的依存关系”。^②日本陆军也于10月2日提出《帝国国策》,要求在华北设立“缓冲地带”,“培养适应于分离倾向的亲日分子并促使其组织化”。^③

为了制造扩大侵华战争的舆论,1934年4月17—26日,日本政府外务省以情报部长天羽英二的名义先后发表声明,公开叫嚣日本是“维持东亚和平的唯一基础,负有全部责任”,并把中国视为日本独占的殖民地,声称“其他外国和国际联盟对于中国实行利己本位政策的时代,已经过去了”^④,俨然以亚洲的主宰者自居。日本关东军驻北平特务机关长松室孝良在给关东军司令部的报告中更加露骨地提出:“现在,满洲市场已臻饱和”,“故华北,诚我帝国之最

^① 远东国际法庭战犯审讯记录(IMTFE)文件三147页C。转引自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著《中国抗日战争史》上卷第301—302页,解放军出版社,1991。

^{②③} [日]《现代史资料》(8),第9、12页,美铃书房,1982。转引自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著《中国抗日战争史》上卷第302页,解放军出版社,1991。

^④ 《1931—1945年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第158—16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好新殖民地”。

1935年5月,日本以中国方面破坏《塘沽协定》为借口,向南京国民政府提出关于中国军政机构退出冀、察两省的无理要求,并从东北调兵入关,以武力相要挟。6月初,在日军的武力威胁下,国民党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与日本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开始秘密谈判。7月6日,何应钦致函梅津,接受日方6月9日信件中提出的无理要求,答应取消河北省与平、津两市的国民党党部,撤退驻河北省的国民党中央军、东北军和宪兵第3团,撤换河北省主席和北平、天津两市市长,禁止全国抗日活动等等。6月27日,察哈尔省代主席秦德纯与日方代表、日本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签订了《秦土协定》,规定撤退驻察哈尔省的国民党军和党部,解散抗日机关和团体,撤销宋哲元察省主席职务,成立察东非武装区。日本由此获得了冀、察两省的大部主权,为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开辟了前进基地。接着,日本又积极策划华北5省(河北、山西、山东、察哈尔、绥远)“自治运动”,组织亲日政权,以实现其变华北为第二个“满洲国”的图谋。9月,日本新任中国驻屯军司令官多田骏发表声明,鼓吹华北5省“联合自治”。10月,日本内阁通过《鼓励华北自主案》。11月11日,土肥原贤二向宋哲元提出《华北高度自治方案》,要求建立华北共同防共委员会,统辖5省两市。11月25日,日本唆使汉奸殷汝耕在河北通县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之后又扶植内蒙的民族败类“德王”组织“内蒙自治政府”。在日本提出“华北政权特殊化”的要求下,南京国民政府于12月宣布在北平设立“冀察政务委员会”。

1936年2月26日,日本陆军中的法西斯分子在东京发动军事政变。以此为标志,日本完成了国内的法西斯统治体制的建立,从而为对外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铺平了道路。5月,日本陆海军中央部经过近半年的研讨和协商,完成对《帝国国防方针》的第三次修改,日本迅速灭亡中国、独霸东亚和称雄世界的侵略扩张计划更为明晰。其如意算盘是:“以迅速巧妙之手段使中国本部归我支配,以日满华三国为基本范围实行自给经济,以武力对付苏联陆上及英美海上之武力,切实掩护我东亚联盟地区,进而寻求制服敌人之方策,开拓战胜之